

中外文学名著

Zhongwaiwenxuemingzhudaodu

导读

主编 韩兆琦

高建为

江西人民出版社



高中语文教学大纲推荐 课外阅读书目

三国演义 罗贯中
红楼梦 曹雪芹
呐喊 鲁迅
谈美书简 朱光潜
哈姆莱特 莎士比亚
堂·吉珂德 塞万提斯
欧也妮·葛朗台 巴尔扎克
普希金诗选 普希金
老人与海 海明威

高中
生版

6
33

写在前面

一部好的文学作品,不仅能使人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增长智慧;更有些能让人认识社会,认识生活,能使人从中悟到如何处世,如何做人的道理。同学们试想,一部《三国演义》,其中包含了多少智慧、多少军事知识啊!几百年来,许多军事家的学习打仗,有人就是从看《三国演义》开始的。再看《红楼梦》,它给人们展现了多么丰富、多么逼真的社会生活啊,它上至宫廷、贵族,下及市井、农村,各行各业,三教九流,无奇不有,无所不包,而其中的任何一幅生活画面又都让人感到无比的真实。我们听到过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过来的青年,谈他们看了巴金的《家》《春》《秋》而勇敢走出封建家庭的经历;也听到过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过来的青年,谈他们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后,坚定了信念,不怕艰难困苦,从而创造出辉煌业绩的历程。法国近代大作家罗曼·罗兰说他笔下的“贝多芬”是“教我们如何生、如何死的大师”;他说读者在读他所写的《米开朗琪罗传》的时候,“在那里,他们可以变换一下肺中的呼吸与脉管中的血流;在那里,他们将感到更迫近永恒。以后他们再回到人生的广原,心中充满了日常战斗的勇气。”(傅雷译《传记五种》)总之,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是人的精神食粮,它能使人思想得到升华,能使人的灵魂受到熏陶。而且这种升华、这种熏陶不是强加的,乃是在一种欣赏艺术、品味人生的过程中潜移默化的。试想《雷雨》的情节、《巴黎圣母院》的故事又是多么精彩动人呢!而读者也就正是在这种愉快的阅读中,感悟到了有益的东西。

正是由于优秀的文学作品有如此重要的价值,所以教育部给高中同学规定了二十部必读作品,即中国的《三国演义》《红楼梦》和外国的《哈姆莱特》《欧也妮·葛朗台》等。这些作品对于多数同学来说并不生疏,有的曾见之于电影、电视,有的曾见之于戏剧、舞蹈,有的见之于小人书、连环画,也一定有不少同学读过其中某一部或某几部的原文。那么现在就按照教育部的要求来制订一个如何阅读这些作品的计划吧。英国当代作家毛姆在《漫谈欧洲大陆文学》一文中说:“如果你阅读这些书或者是其中的任何一本,你会觉得不但在精神上有所得益,而且感到乐趣。希望你在读了它们之后,将来回头想到它们时,会像我一样,觉得没有白读。”我想教育部为我们规定的这二十部书,更会是这样的。

这些作品有的产生在几百年以前,有的产生在异国他乡,其中所描写的人物故事,所表现的思想情绪,有些我们理解,有些也可能不理解,于是这就需要有人加以辅导。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编写了这本《中外文学名著导读》(高中生版)。这里共有二十篇文章,分别对二十部名著进行了介绍。其中包括该书作者的简要生平,该书所写的基本内容,该书中的主要人物与对这些人物如何理解、如何评价,以及该书的主要艺术成就等。由于各书的特点不同,因此在介绍这些作品时,也就各自有所侧重。又因为每篇文章只有万字左右,所以许多问题不可能展开详谈。同学们阅读了原著,阅读了我们所写的这些辅导文章后,还有哪些不理解的问题,可以先在伙伴之间相互讨论,也可以请身边的老师和家长给以指导,当然也可以给我们这些辅导文章的作者写信,请他们进一步谈谈他们的看法。

欢迎同学们对本读物提出宝贵意见。

北京师范大学 韩兆琦 2001年6月24日

目 录

《论 语》简论	1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韩兆琦	
《三国演义》简论	11
文化艺术出版社/郑向前	
《红楼梦》简论	22
中央艺术研究院教授/林冠夫	
《呐 喊》简论	32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蔡清富	
《女 神》简论	46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蔡清富	
《子 夜》简论	59
温州大学副教授/金凡平	
《家》简论	74
温州大学副教授/金凡平	
《雷 雨》简论	88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富仁	
《围 城》简论	111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易鑫鼎	
《谈美书简》简论	123
中央艺术研究院/郑 雷	

《哈姆莱特》简论	136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高建为	
《堂·吉珂德》简论	149
北京师范大学/杨学婷	
《歌德谈话录》简论	159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高建为	
《巴黎圣母院》简论	174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高建为	
《欧也妮·葛朗台》简论	183
北京师范大学/赵怀俊	
《匹克威克外传》简论	193
北京师范大学/赵怀俊	
《复活》简论	204
北京师范大学/李春玲	
《普希金诗选》简论	215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张冰	
《老人与海》简论	226
北京师范大学/赵怀俊	
《泰戈尔诗选》简论	234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乃英	

《论语》简论

《论语》共二十篇，是孔子与其门人的对话录，由其门人及其门人的门人记录、整理、编订而成。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今人李泽厚说：“就字面直译，‘论语’就是经过整理、撰次的对话，也就是‘对话集’之义。”并说：“其实望文生义，‘论语’者，译为‘讨论的话语’，亦无可不可也。”《论语》二十篇的标题，是取其每篇第一句的开头两个字，如第一篇的开头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子曰”是每篇如此，没有特点，于是便取用了“学而”二字作了第一篇的题目。第二篇的开头一句是“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于是便将第二篇定名曰“为政”。这种方式就和《诗经》三百零五篇诸如《关雎》、《七月》等的命名方式完全相同。

《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以及先秦儒家观点的最早、最主要的资料，其他如《左传》、《史记》等都是次一等的。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鲁国曲阜人。生于公元前55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年青时曾给鲁国权臣季氏作过乘田、委吏等小官，后来在鲁国做过司空、司寇，并以傧相的身分陪同鲁定公与齐景公会谈。《史记》说孔子当过鲁国宰相，这是不可能的。孔子一生最主要的是从事教育，并对《诗》《书》《礼》《乐》《易》等古代文化典籍，进行过若干整理，并以之为教材，培养学生。这些经过孔子整理、阐发的几种古代典籍和孔子自己

撰写的《春秋》，在汉代尊儒后都被称为学界的“经典”。相传孔子的弟子多达三千，比较杰出的有七十二人，这种说法估计也有不少夸大，但孔子作为我国古代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这是没有虚夸的。关于孔子的思想学说，我们从《论语》中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孔子的政治思想。孔子自少胸怀大志，原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其主张不被当时的各国诸侯所采纳，故而无所建树。其政治理想大体为歌颂尧、舜，他认为尧、舜、禹是最理想的远古帝王，他们之间的那种“禅让”是“天下为公”，他们的道德是至高无上的。其次是歌颂夏、商、周的三代初期，尤其是周朝的文、武、周公。三代的“社会”虽然已经进入了“家天下”，比尧、舜时代低了一等，但他认为三代初期的政治开明，整个国家的秩序好。他所梦想的是“行夏之时（历法），乘殷之辂（车子），服周之冕（礼帽）”（《卫灵公》）。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他说：“甚矣，吾衰矣，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他认为西周初期是“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季氏》）。总之，孔子对于他所生活的春秋时代是不满意的，但他的理想是怀恋从前，是引导人们向后看，这就是人们给儒家学派所定性的“开倒车”。

孔子的政治思想虽然不先进，但他对于治国治民的许多主张与做法却是很受历代人称颂的。例如孔子讲“仁”。什么是“仁”呢？孔子有三个说法，一是“爱人”；二是“泛爱众而亲人”；三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上三条分别见于《颜渊》与《学而》）当其学生子贡问他“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能否算是“仁”的时候，孔子高兴地说：“何止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连尧舜都难得做到）（《雍也》）孔子的弟子冉求给季氏当管家，帮着季氏向他家领地上的农民横征暴敛，孔子生气地说：“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这些思想都分明具有反暴政、反对残酷掠夺、同情下层人民

的性质。又如孔子要求各级官吏要公正无私,要对自己的工作负起责任。他说:“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矣!”(大意是:有那份能力就干那份工作,没那份能力就别占那个位置。明明看着国家的形势危险,而不去伸手扶一把,这样的官僚要他们干什么!)(《季氏》)孔子谴责那些自私自利、患得患失的人说:“鄙夫可与事君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得患失,无所不至矣。”(《阳货》)意思是说,一个官僚如果患得患失,那他就什么事情都会干得出来。后来的秦朝丞相李斯就是由于他的自私自利,保官保命,而被赵高拉上贼船,接着出卖灵魂,倒行逆施,终于导致了秦王朝的灭亡。自古以来这种事例多得很。孔子要求各级官僚都要以身作则,要起表率作用。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又说“苟其身正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矣,如正人何?”(大意说:如果你自己办事公正,治国就没有困难;你自己行为不正,又怎能领导别人?)(《子路》)这些话直到今天也还是至理名言。

二、孔子的教育思想。孔子对政治方面说过许多话,但由于他自己基本上不是政治家,所以那些话也只能是说说而已,没法以政治手段大力推行;相反孔子自己是个教育家,他的许多言论都是从他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所以这个方面才是孔子学说的最精华、最杰出之处。首先孔子讲“有教无类”(《卫灵公》),讲“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从此把教书育人推广到整个社会,打破了以往的“国子学”只是教育贵族子弟的格局。孔子是民间教育、社会教育的第一个开创者,他并不像有些人那样单方面地鼓吹“师道尊严”,而是把老师与学生的关系看得非常辩证。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这种虚心学习、广益多师,这种要想当好先生就必须先当好学生,以及先生与学生应相互学习彼此长处的思想,都是极其精到的。后来唐代的韩愈更对孔子这番话做了

进一步的阐发,他说:“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哪管)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已经非常精彩了,接着韩愈又强调说:“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师说》)今天我在讲台上,你们是学我的长处;明天你在讲台上,我们又学你的长处,老师与学生就是这样教学相长,相辅相成的。孔子甚至还说过“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也就是说当老师说了错话,做了错事的时候,学生理所当然的应该起来予以纠正。这种思想很富有民主性,它与后来某些迂腐儒生对其先生只知亦步亦趋的盲从,甚至对其讲错了的东西也千方百计予以辩护的做法完全对立。

孔子在学风方面教导学生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政》);他说:“亡(无)而为有,虚而为盈,约(穷)而为泰(富),难乎其有恒矣。”(《述而》)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实事求是”,老老实实,不要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孔子讲述自己做学问的经验是:“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为政》)也就是说:掌握资料越多越好,临到自己表态的时候则要慎重,没有弄明白的东西不要轻于下结论。孔子强调“毋意(不要凭空猜想)、毋必(不要贸然断定)、毋固(不要固执己见)、毋我(不要以自我为中心)”(《子罕》)。这也就是毛泽东当年所提倡的“反对主观主义”。

在学习方法上孔子讲过的许多话,至今还广泛地流传在人们口头。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等等。但相比之下,还是以他在教学方法上所讲的“启发式”与“因材施教”最为突出。关于前者,孔子说:“不愤不启,不

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所谓“愤”、“悱”，都是指学生希望弄懂某个问题时的迫切之情，当教师把学生的求知欲望调动起来后，然后再予以点拨，这样就能达到用力小而取得的效果显著。可惜在《论语》中孔子没有将这一观点充分展开，所以我只好引一个别处的事例了。《史记·信陵君列传》写秦兵包围赵国邯郸，赵王向魏王求救，魏王本来已经派出了大将晋鄙率军十万往救，但后来在秦国的威胁下，他又让晋鄙在中途停止下来。赵国的情势紧急，求救于信陵君。信陵君无法劝说其兄魏王发兵，故而只好带着自己私家的一些人想去和赵国一同与秦国拼死。临行前，信陵君到魏国的东门与他的朋友侯嬴告别。侯嬴说：“公子勉之，老臣不能从。”等到信陵君走出了几里地，心中不快地想到“吾所以待侯生者备矣，天下莫不闻。今吾且死，而侯生曾无一言半辞送我，我岂有所失哉？”于是复引车还，问侯生。这时“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还也’”。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侯生有话不早说，非要罚人家去转了一圈，这是在卖什么关子呢？我们认真地想一想：侯嬴准备给信陵君出什么主意呢？窃兵符。窃谁的兵符？窃其兄魏王的兵符。窃符的结果是什么？是夺取其兄所派出的十万大兵。这个干系实在是太大了，不到一定火候能轻易地说么？出发前，信陵君并未诚恳地向侯嬴求教，如果那时候侯嬴赶着给信陵君出此主意，与信陵君出去几里地，心中疑惑不解地重又回来向侯嬴求教时，侯嬴再出此主意，两者的效果一样么？于是侯嬴这时一说，信陵君便立即采纳了。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我想所有大、中、小学的老师们都应该从孔子的这句话、从侯嬴这种做法中悟出点什么。

至于“因材施教”，《论语》里的材料较多。如孟懿子、孟武伯都是向孔子问“孝”，孔子对孟懿子的回答是“无违”，对孟武伯的回答是“父母惟其疾是忧”。孔子为什么回答孟懿子说“无违”就是“孝”呢？“无违”就是不要违背礼节。孟懿子是鲁国的大贵

族,大贵族让其父母锦衣玉食,气使颐指,是不难做到的。但孔子认为孟懿子能让其父母高兴的,不是这个,而是应该让自己的一举一动都符合礼节。当时鲁国的另一家大贵族季氏就曾搞过许多越分的事情,如“八佾(六十四个演员排成八行)舞于庭”、“旅(祭祀)于泰山”等,这些都是只有周天子才有资格做的事,孔子要孟懿子不要跟着季氏学。孔子为什么对孟武伯说“父母惟其疾是忧”呢?这是因孟武伯为人好勇,好勇就难免不安分。于是孔子告诉他:“你父母对你最不放心的就是你的自身安全,你不要在这方面总让他们替你操心。”

孔子的学生子路向孔子问“闻斯行诸”(见到了该做的事情就立刻做吗),孔子回答说:“有父兄在,如之何闻斯行之?”(家里有父母兄长,怎么能自己想干就干呢?)子路出去了,冉求进来刚好又向孔子问同一个问题,孔子说:“闻斯行之。”(见到了该做的事情就立刻做。)公西华见孔子对两个人的同一问题回答两样,问孔子为什么。孔子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意思是说:“冉求的为人,胆小懦弱,所以我要鼓励他;子路则敢作敢为,所以我要对他压着点。”

以上的“启发式”与“因材施教”,都已经成了现代教育学上的重要原则之一,而它们都是在两千五百年前由孔子首先提出来的。

三、关于个人修养与为人处世的准则。这里面有许多问题是属于道德、伦理范畴的,其中有封建性的东西,也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由于都是片言只语,难免杂乱,有时甚至相互矛盾。我们这里只是提出其中的若干部分,加以叙述:

其一,孔子认为人要有节操,要有原则性,要勇于追求真理,要敢于见义勇为。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又说“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子张》);又说“朝闻道,夕死可也”(《里仁》);又说“见义不为,非勇也”(《为政》)。都是说为了真理正义,在关键时刻要旗帜鲜明,即使付出

牺牲,也应无所顾惜。孔子还说,一个人在身处逆境的时候,不能软弱妥协,要坚守自己的人格。其最精彩的话语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孔子这些话在他身后的两千多年里确实是鼓舞了历朝历代的许多仁人义士为真理正义而前仆后继地奋斗着,诸如文天祥、于谦、谭嗣同,以及现代革命史上的许多先烈就都是这样的。

其二,孔子认为人都有追求富贵的本性,但这种追求必须要合乎正道,不能降低自己的理论,更不能违背自己的本性,出卖自己的灵魂。一个人如果不能凭正道取得富贵,则宁肯忍受清贫。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去之,不去也”(《里仁》)。以孔子的名声与才干,只要他降低一些调门,找个官做会成为问题么?但是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于是孔子就一生到处碰壁,穷困终生。但孔子并不觉得自己的穷困清贫是耻辱,而是以此感到心安理得。古往今来的无数事实告诉我们,在金钱名利的诱惑面前,能够坚持操守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当今许多身分极高的贪官污吏一个个地被送上法庭就是很好的说明。孔子对这一类的事情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小人遇到穷困就会任意胡来);又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仁的人忍受不了长时间的穷困)。用孔子两千五百年前说的话,来分析两千五百年后我国现时的这些巨贪,不得不令人深深感叹孔子这些话的深刻性。孔子自己与他门下的那些高才弟子则都是断然地拒绝了腐败官场对他们的类似诱惑。孔子自己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孔子称赞他的弟子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身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又称赞子路说:“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自己穿着破袄与穿着狐裘的达官贵人站在一起而不感到难堪),其由也矣。”(《子罕》)

其三,孔子还教导学生要孝敬父母,尊重老人;告诫学生对

朋友、对同事都应该保持一种良好的关系准则。孔子说“事父母能竭其力”(《学而》);又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意思都是说要关心父母,要尽量多帮他们做些事。如今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多数家庭的吃穿已经不成问题,这时子女对父母的“孝敬”就主要表现在态度上。孔子对此有句话很值得我们现在的青年深思。孔子说:“今之孝者皆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父母并不一定要儿女们寄多少钱,买多少东西,他们更希望的正是像一首歌中所唱的那样,要儿女们多回家看看,多陪父母说说话,让他们的心情愉快。

孔子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意思是朋友相处应该有个正确的原则,相互之间应该是以义相扶,切磋善道,共同不断提高,而不是狼狈为奸,勾结起来做坏事。孔子认为有益的朋友是“友直、友谅、友多闻”。他正直,能纠友之偏;他讲信义,遇事能倚靠;他见多识广,能向他学到东西。如果你不小心交上一些“便辟”(八面玲珑)、“善柔”(曲顺迎合)、“便佞”(伶牙俐齿)的人,那就有百害而无一利了。在朋友、同事之间,孔子曾多次强调要“言而有信”。孔子的学生曾子每日“三省”中的两项,就是“为人谋而不忠乎”和“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孔子强调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卫灵公》),这也就是毛泽东当年所说的“责己从严,责人从宽”。

除以上三方面外,《论语》中还有许多关于社会人生的精彩格言,如教导人办事不要中途而废的:“譬如为山,未成一簣(就差一筐土),止,吾止也;虽覆一簣(虽然只增加了一筐土),进,吾进也。”(《子罕》)如感慨某些人开始不错,后来无成的:“苗而不秀者,有以夫;秀而不实者,有以夫。”(《子罕》)如提醒人做事要谨慎,不要忘乎所以的:“三思而后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卫灵公》)如提醒人要多做少说,不要夸夸其谈的:“君子欲敏于行而讷于言。”(《里仁》)如教导人办事不要急于求成的:“无欲

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如教导人要胸襟开阔,不要疑神疑鬼,患得患失的:“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如教导人要勇于承认错误,不要遮遮掩掩,更不要文过饰非的:“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焉,过也,人皆见之;更(改正)也,人皆仰之。”(《子张》)类似的精彩格言还多得很。中国古代典籍中的话语,能在后代广泛流传于中国人民之口头,并大量变为典故、成语的,其比例之大,再没有第二部能超过《论语》。其所以能够如此,一方面是由于明、清时期的五百年间,《论语》一直被钦定为科举考试的规定教材之一,因而客观上流传广泛;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论语》自身的语言的确是如精金美玉,太优美、太成熟了。

以上诸项基本上都是选择与我们当前社会有关的一些进步的方面。我们开头就说过,《论语》是一部孔子的语录,我们从这些已经脱离了具体语言环境的语录中虽然可以大体窥见孔子,但断章取义的主观性与随意性是肯定不会少的,这是其一;其二,孔子生活在两千五百年前,当时天下大乱,正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之中。孔子不满意当时社会的战乱与黑暗,但因为他看不到未来,于是只好向往传说中的尧、舜与文王、武王、周公。至于尧、舜与文王、武王、周公时的政治究竟是怎么一种好法,其实他也没有见过。说到底,孔子的“开倒车”,实际上不过是表现了一种不满现实,希望改革当时社会的愿望而已。如果非要把这一条说成是孔子的“局限性”,我觉得就似乎过于“认真”了。孔子的确有他的局限性,最重要的就是他构筑了一套比较圆通的政治以及伦理道德的体系,而且希望把他的这种体系变成当时的社会现实。他希望通过他的说教,能使整个统治阶级受到感化,从而克制、收敛他们的欲望;同时通过说教,也使被压迫、被统治者受到感化,克制、收敛他们的“欲望”,从而使这些被统治者、被压迫者遂与统治者、压迫者“和谐”、“安乐”地共同生活在一种严格对立的等级社会之中。用孔子的话说这就是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做“君”的要永远像“君”,做“臣”的要永远像“臣”;做“主人”要永远像“主人”,做“奴隶”的要永远像“奴隶”。这样一来,对谁有利呢?孔子的美好学说,究竟在为谁保驾?当然是对统治者有利,是为统治者保驾。要不然,你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两千多年来的历代统治者都尊孔,以及为什么孔子老家曲阜的那些殿堂与坟墓会越修越高,越盖越阔。许多农民领袖在刚造反时都是反孔的,等到一作皇帝,立刻变为尊孔,其原因就在于孔子的理论有助于维护与巩固阶级社会的既定秩序。因此,当我们已经进入 21 世纪还在向青年少年介绍孔子的时候,必须向他们说清:孔子作为一个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其整个思想体系是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的,应该否定;但是在孔子的理论中有许多精彩有用的东西,今天仍可以摘取出来,为我们新时期的政治思想、教育思想所吸收、所采用,这就是我们今天之所以还在或局部、或全部的向读者介绍《论语》的原因。为了理解一种文化,到曲阜旅游是很好的;至于有人烧香、叩头,虔诚地向孔子顶礼膜拜,我看就免了吧!

《三国演义》简论

《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第一部根据评书底本改写而成的历史演义小说。中国古代小说源远流长,其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远古的神话传说。到晋代志怪小说出现,标志着小说开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诞生。唐传奇达到文言短篇小说创作的高峰。到宋代,出现了作为说书底本的白话小说——宋话本。在元朝,科举制度基本被废止,文人仕进之途受阻,直接导致戏剧、小说创作的兴旺,从而诞生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两部伟大的作品。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名本,生平事迹不见于史传,而一些有关他的材料记载也是互相矛盾,今人一般认为明代贾仲明的《录鬼簿续编》中的记载较为可靠,称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由此推断,罗贯中的主要活动时期应该是在元代。

罗贯中的作品,有戏剧小说多种,杂剧今存《赵太祖龙虎凤云会》,相传《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等小说也是他的作品,并且他还是《水浒传》的作者之一。

从晋代陈寿创作《三国志》,到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化时期。三国的故事很早就已经在民间流传,晚唐诗人李商隐的《娇儿诗》有“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等句,说明三国故事已为大家所熟知。北宋时期,说书艺人中有以“说三分”(即以三国故事为评书内容)著称的,现存的惟一一部

刻本《全相三国志平话》出现于元代。南宋、金元之际，戏剧昌盛，剧作家们把大量的三国故事搬上戏剧舞台，现存剧目有三十多种。

根据《三国演义》书中地名变化情况来看，成书应当是在元朝末年。但作品广泛流传则在明代中叶，现存最早的刻本，是明代嘉靖年间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清朝初年，毛纶、毛宗岗父子对《三国志通俗演义》作了较多修订，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三国演义》一般都是这个本子。

值得注意的是，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毛氏父子修订后的《三国演义》从形式到内容都有较大不同。《三国志通俗演义》全书由二百四十则故事组成，分为二十四卷。毛氏父子将其改为一百二十回的章回体小说，改回目为对偶，并对其中一些史实进行了考订辨正，全书语言更加书面化，使作品的艺术成就得到提高。同时，书中的思想倾向、人物形象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首先，毛本《三国演义》提出了“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观，用“分”与“合”的观念概括历史发展。应该说，它比较符合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轨迹。当然，作者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做到用科学的观点去分析和解释历史，揭示历史发展的本质，这是我们所不能苛求的。

其次，毛本强化了原书中的“拥刘反曹”倾向。《三国演义》故事定型于金元时期，当时中原大地处于女真、蒙古等民族统治之下。由于这些游牧民族文化水平较低，生产力落后，统治残暴，尤其是蒙古统治，把人分为四等，汉人和南人处于最底层，这不能不激起汉民族的反感和对汉族统治的怀念。这种情绪反映到三国故事中，原先处于统治地位的刘氏被奉为正朔，取刘氏而代之以曹氏被斥为“汉贼”，也就不奇怪了。

但罗贯中并不仅仅根据姓刘还是姓曹来品定人物。他在书中，不止一次说出“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刘